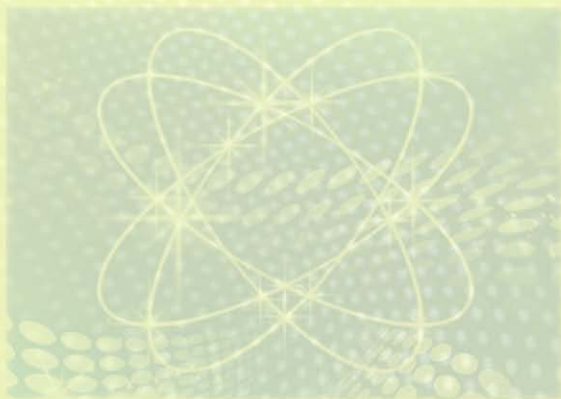


《朝日新闻》武汉会战报道汇编（1）



总 序

1937年11月，日军攻占南京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但将大部分政府机关和军事统帅部留在了武汉，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也驻留武汉，武汉成为当时中国全民族抗战的中心。中国抗战进入了武汉抗战时期。

日军攻占南京后，又发动了徐州会战，对武汉虎视眈眈。为了保卫大武汉，国民政府先后调集100多个师100万余人的兵力，利用大别山、鄱阳湖和长江两岸地区有利地形，组成了武汉防卫圈。

日军为了攻陷武汉，不惜倾全国之力，投入了陆海空三军30余万人、飞机500余架、军舰120余艘。1938年6月，日本开始进攻武汉外围地区，6月11日夜袭安徽安庆，武汉会战拉开帷幕。

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日双方投入的兵力最多、战线最长、时间最久、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也是中国军队歼灭日军人数最多的一次战役。

100万余中国军队对抗30余万日本军队，这是多么壮观的战役！可惜，中国军队虽然占有数量上的优势，但是装备陈旧、缺乏训练、机动力差、指挥系统混乱、缺乏海军支援、没有制空权，加之防线广大，而不得不分散兵力。所以，会战以日军占领武汉告终。1938年10月25日，汉口沦陷，武昌、汉阳也相继失守，武汉从此被日军的铁蹄蹂躏达7年之久。

日军发动武汉会战的目的，在于以这场战争逼迫中国——当时主要是指逼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签订城下之盟。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中国共产党的无私支援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日本虽然打赢了这场局部战役，但迫降蒋介石政权的企图落空，从此陷入中国战场的泥沼里不能自拔，直至1945年战败投降。

中国军队在整个武汉会战期间，虽未能保住武汉地区，但基本实现了蒋介石预定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战术，以消耗日军有生力量为目的。此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初期影响极为深远的一次战役。它不仅彻底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和逼迫中国投降的梦想，也再次表现了中国军民保家卫国不惜牺牲的顽强精神。中国军民的奋战，不仅为工厂内迁和战略转移赢得了时间、提供了保护，也在国际上获得了广泛的称赞和支持。在强敌面前，中国各党派和团体团结一心，政治清明，民气高涨，军队勇敢。完全可以说，武汉抗战时期是整个抗战时期最值得称道的时期，值得大书特书。

武汉会战，日本方面通称为“武汉攻略”或者“汉口攻略”，中国方面习惯称之为“武汉抗战”，现在已认同武汉会战只是武汉抗战的一个阶段。关于武汉会战，日本方面在战争中即有大量的报道和记载，战后又整理了大量的战史及回忆类文章，也有不少的研究成果。而中国方面，包括台湾在内的学术界，对武汉会战的研究均较薄弱。大陆方面，1980年代曾经出版了《武汉抗战史》（欧阳植梁、陈芳国主编，武汉出版社1985年出版）、《武汉抗战史料选编》（李泽、徐明庭等选编，武汉出版社1985年出版）、《武汉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武汉会战》编审组编，文史出版社1989年出版），并整理翻译了日本《战史丛书》中部分书籍编成《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华民国史料丛稿”之一，中华书局

1981年出版、《中国事变海军作战史》（“中华民国史料丛稿”之一，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1990年代出版了《兵火奇观：武汉保卫战》（敖文蔚著，1995年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2000年代出版了《武汉抗战图志》（唐惠虎等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武汉抗战史料》（田子渝主编，武汉出版社2007年出版）、《鏖兵江汉：武汉会战》（谭飞程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这些对推动武汉会战及武汉抗战研究都有帮助，但与武汉会战的地位相比仍不相称。

2008年10月25-28日，江汉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华中师范大学、政协武汉市委员会等单位联合举办了“武汉抗战与民族复兴”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日本、美国、德国等地的10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者高度肯定了武汉会战及武汉抗战的地位和作用，一致认为应该加强对武汉抗战的研究。当务之急是，应该加强对武汉会战史料尤其是日本方面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会上，成立了江汉大学武汉抗战研究中心，并聘请了章开沅、张宪文、杨天石、虞和平、肖牲、麦金龙（美）、邓红（日）、陈芳国、田子渝等国内外专家为特约研究员。会后，江汉大学武汉抗战研究中心开始策划、收集、编译、出版日本方面关于武汉会战的史料，以填补国内这方面研究领域的空白，推动相关研究。本丛书《武汉会战日方资料丛编》，便是相关人员几年来为此努力的成果。

本丛书的编译范畴，是1938年6-10月即武汉会战期间我们现在能看到找到的日方资料。丛书共4卷6册：一是《〈战史丛书〉武汉会战资料汇编》，收录了当时日本政府及大本营关于武汉会战的决策命令等，记述了日军在武汉会战中的进程，是日本方面研究武汉会战的重要成果；二是《〈朝日新闻〉武汉会战报道汇编》，共分3册，收录了《朝日新闻》关于武汉会战的新闻报道，同时收录日方关于中山舰的相关资料，动态地反映了日军

进攻武汉的详细过程；三是《武汉会战日军参战部队战史选译》，包括《熊本兵团战史》和《乡土部队奋战史》中关于武汉会战的内容；四是《武汉会战日方图片汇编》，以当时日本出版的历史写真图片为主，也收录了战后日本部分研究著作所披露的图片，具体而直观地反映了日军在武汉会战中的表现和罪行。整套丛书对于全面而具体了解日军在武汉会战中的情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当然，丛书内容带有浓厚的日方感情色彩，比如对日军作战力的吹嘘和对中国军队的鄙视污蔑等。请读者阅读和使用时要注意批判鉴别。

本丛书由杨卫东、邓红策划，史料来源主要由邓红提供，丛书内容、编译体例由邓红、邓正兵、刘庆平协商议定，编译者由邓红、邓正兵负责组织，分别来自江汉大学、日本北九州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武汉大学、武汉图书馆、武汉博物馆等单位。杨卫东审阅了部分书稿并提出了具体修正意见，邓红、邓正兵审阅、校注了全部书稿，邓正兵最后定稿，涂文学自始至终关注着丛书的出版，并提出了许多指导性意见。希望丛书能推动武汉会战及武汉抗战史的研究。由于时间仓促，编注者水平有限，书中缺点和错误之处必定不少，恳祈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

《武汉会战日方资料丛编》编委会

2012年5月20日

编译说明

本书是《武汉会战日方资料丛编》的第二卷第一册，为《朝日新闻》1938年6月和7月关于武汉会战的报道汇编。再加上两个附录：一为《朝日新闻》关于2月18日、4月29日武汉空战相关报道；二为关于中山舰的资料汇编。至于《朝日新闻》与战争的关系，可参见本书邓红撰写的《从〈朝日新闻〉报道看到的“武汉攻略”》一文。

由于是日方报刊原始资料，本书采用如何编辑、如何翻译的方法颇费周折，所以在此预先对编辑、翻译的方针和凡例说明如下。

一、本书只翻译和“武汉会战”直接有关的、具有史料价值的报道和特写文章，而对那些无关紧要的文章或有关但没有历史价值的东西不予翻译，譬如对日军战亡者的生前回忆、家属的“化悲痛为力量”、日本国内庆祝“汉口攻略”之类的文章，就置之不用。

二、书中每一版面上的新闻报道序号是按照铅字的大小从右往左数。有时虽有小标题，但和前面一条有直接关系的，就算进前面一条而不另数。

三、为了保持史料的原貌，更清楚地表现当时日本军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野心，本书基本采取“直译”的方法，对那些炫耀日军“武功”和“战绩”以及那些充满敌方感情和鄙视中国的文字也直接译出，请读者注意鉴别和批判。

四、日本当时蔑视中国，不称“中国”而称“支那”，书中所谓“支那事变”、“北支那方面军”、“中支那派遣军”等，中国方面称为

“中国事变”、“华北方面军”、“华中派遣军”等。本书为尊重固有名词直译的学术习惯,将所有“支那”一词全部原封不动地直译。关于日军的编制、军衔等,也尽量直译原有的日文,譬如“师团”、“支队”、“大佐”等。

五、由于时代变迁和日本方面的道听途说,日文原文中的一些关于中方的汉字人名、地名可能不太准确。我们在翻译时,做了初步校正和注释,但有少数人名、地名无从稽考,只有依据日文原文,使用时请和中方资料互相参照。

六、文中大量出现的某某地名、某某部队、某某武器等,“某某”原文为“○○”,是日本军方在检阅审查新闻报刊时,为了怕泄露军事机密而临时换上去取而代之的。

七、关于历史照片的处理,本丛书特编辑了《武汉会战日方图片汇编》,收入了我们能够找到的有关武汉会战的图片。另外,在每一卷里相应地插入了一些《朝日新闻》刊登的照片。由于《朝日新闻》刊登的照片为当时的随军记者所拍摄,其内容、对象、角度等,大都是为战争服务的,故只选择插入了一些具有历史资料性的东西。

八、本书主要由华中师范大学日语系日本籍教师东哲也翻译,邓红负责译文的中文表达、润色和注释。附录部分由日本北九州大学教授邓红独自编译。江汉大学教授邓正兵校阅了全书。

编译者谨记

2012年6月15日

从《朝日新闻》报道看到的“武汉攻略”^①

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学教授 邓红
江汉大学武汉抗战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在近代,报刊为传播信息的最重要的工具,堪称舆论之王。而《朝日新闻》是1938年当时日本国内发行量最多的报纸。该报虽然现在呈左倾报刊的形象,又历来主张“不偏不党”,但在二战前和战争中,却是热衷于军国主义宣传的喉舌之一。

特别是在武汉会战期间,《朝日新闻》派出了强大的采访报道阵容,还不惜血本派出三架在当时来说是最先进的螺旋桨飞机,将战况、日军的战斗场面乃至武汉市内的情形等拍成胶卷加以接力传递,实乃今日电视、电台乃至网络现场实况转播之滥觞。

为了发掘日本方面有关武汉会战的历史资料,我们特将《东京朝日新闻》1938年刊登的所有和“武汉攻略”有关的记事翻译、编辑成书。下面,首先想简单地介绍一下《朝日新闻》的基本情况、与战争的关系和报道战争的方针。

一、《朝日新闻》的历史和战时的日本媒体

《朝日新闻》是日本三大综合性日文对开报纸之一(其他两家

^① 本文为2008年10月在江汉大学举行的“武汉抗战与民族复兴”国际学术研讨的发表论文修改而成。

是《读卖新闻》和《每日新闻》),现在也号称日本五大或六大主流报纸之一(除上述三家外,再加《日本经济新闻》、《东京新闻》或《产经新闻》)。

《朝日新闻》是1879年1月25日由村上龙平和上野理一在大阪创刊的私人报刊。“朝日”一名蕴含“旭日升天、万象惟明”之意。下图为“朝日新闻”刊头的四个大字,其字体据称取自欧阳询《宗圣观记》。

《朝日新闻》草创时期为插图小报,以“不偏不党”为办报方针。1888年在东京增印《东京朝日新闻》(简称“东朝”,而原来在大阪发行的叫“大朝”)。1940年9月1日在各地出版的报纸,统一名称为《朝日新闻》。到“武汉攻略”时的1938年,日均发行量已经达到248余万份,居各报之首。

昭和以来的战争期间,日本民众的主要信息来源是报纸。广播电台的普及率不高,譬如1926年时只有20%,1945年不到50%,且只有国营的NHK一家。持有能收听外国电台的短波收音机,则被视为违法。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大力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制度和统治方式,各种报刊的诞生如雨后春笋。政府对舆论的控制,没有采取直接办报纸的方式,而是用各种法律和法令来限制办报自由,封锁反政府的言论活动。

1875年(明治八年)明治政府制定的《新闻纸条例》,对报刊杂志作出了种种苛刻的规定,譬如办报需要得到政府的许可证;明确社主(老板)、编辑者、印刷者的权限和责任,如违反将受到罚金乃至有期徒刑之惩罚;不准刊登报道政府的坏处、颠覆国家的记事以及煽动他人的记事等;甚至规定不准使用笔名。

1909年明治政府制定《新闻纸法》,虽然对以上苛刻规定有所



缓解,但规定不能发表各政府机关和议会没有公布的文书、还在搜查中的事件以及还未公开的法院审理案件时的辩词;陆军、海军、外务大臣可以根据军事外交需要禁止刊登,内务大臣也可以根据停止刊登和贩卖有“破坏秩序的安宁和风俗的”记事的报刊等等。

1924年制定、1928年修改的《治安维持法》,规定可以对任何不听指示的报刊进行惩罚,从而起到了统制言论、弹压思想的重大作用。

1937年“支那事变”(即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制定了《军机保护法》,规定有关“作战、用兵、动员、出师乃至其他军事上的机密”都属于“军机”而加以保护,言论思想的统制更加严密。

1938年以“武汉攻略”为契机制定的《国家总动员法》,则授予政府具有无限制的统制言论的权限。

对于报刊本身来说,和政府作对固然要受到惩罚;另一方面,在战争动员时期和战争打得还算顺利的初期,面对日本国内一步一步高涨的军国主义思潮和民族主义情绪,如果不积极地自觉地迎合政府的爱好憎恶和大众的需要的话,报纸也卖不出去。战争对于报刊杂志来说是新闻报道的宝库,大众是报社老板的钱袋子,再加上政府在后面鞭策,于是以《朝日新闻》为首的日本报刊上,出现了争相以美好的辞句报道对中国的战争是如何的势如破竹、皇军如何的英勇、庶民们如何自觉协助战争等等的情形。

二、《朝日新闻》报道“武汉攻略”的阵容

根据《朝日新闻社史·大正昭和战前编》^①，“武汉攻略”一打响,《朝日新闻》社立刻派出了近400名记者、摄影师、电影班、航空

^① 《朝日新闻社史·大正昭和战前编》,朝日新闻百年史编修委员会编纂,朝日新闻社1991年出版。

部员、无线电技师、传书鸽子班、设营班、后勤联络员等，展开了海陆空全方位的立体性报道。在上海设立了临时电报局，采用了当时来说是最先进的无线电通信机械和技术。从前线直接运输胶卷的有“白鹭”、“汐风”和“海风”号三架飞机。溯江方面派大阪朝日新闻社会部次长木村亮次郎、大别山方面由天津通信局长高桥顺一郎分别担任前线本部长。等等。

据称，当时日本新闻界大概有 2000 人参加“武汉攻略”的报道，而《朝日新闻》堪称人数最多、阵容最强大。

值得强调的是，《朝日新闻》在当时拥有最先进的民间航空技术。据《朝日新闻社史·大正昭和战前编》记载，1937 年 4 月，朝日新闻社的螺旋桨飞机“神风号”从日本大阪起飞，途经台北、万象、卡拉奇、巴格达、雅典等后抵达伦敦，总飞行距离为 15353 公里，只用了 94 小时 17 分的时间，创下了当时的世界航空纪录。飞行员为饭沼正明，副手为冢越贤尔。“日中战争”一开始，这一技术立即被运用于战争报道。

顺便说一句，《朝日新闻》也非常重视“号外”的发行。武汉陷落时《朝日新闻》发出的“号外”，起了重大作用。对此，我们在下面还要提及。

而步行跟随快速部队急行军,全军将士看到日本女性的出现时感到吃惊,怀疑自己是在做梦吧!林桑出现在荒凉的武汉平原这件事本身就是奇迹。她的勇敢和谦让的美德,让全军将士感到由衷的尊敬和感谢。”等等。把林芙美子描写成了日本的民族英雄。

三、“武汉攻略”报道版面的式样和特点

当时的一份《朝日新闻》每天都要发行“朝刊”(即“早报”)和“夕刊”(晚报)两部。由于当时的印刷和运输投递贩卖条件所限制,“夕刊”要第二天的早上才能到达读者手里,虽然写的是第二天的日期,但实际上是头天晚间印刷的。如上页图所见,1938年8月缩印版以8月1日开头,第一页天顶上印刷的日期是“昭和十三年八月一日”的字样,但在刊头《夕刊·朝日新闻》的下面注明“三十一日(七月)”的字样。

一般来说,每天的夕刊发行6页,朝刊发行10页。为了显示一天的报纸是以夕刊开头,夕刊的第1页一般都刊登最重要的消息,实际上是“头版头条”。而朝刊的第1页全是广告,第2页才刊登这一天的重要消息。

也就是说,有关战争的消息主要登载在夕刊第一版和报道时事的朝刊第二版。另外,艺能(文艺)栏和社会版还刊登一些有关军人生活的花絮和具有军国主义色彩的文艺作品。《朝日新闻》关于“武汉攻略”报道的特点,可总结如下:

(1) 速度特别快。一般都是第二天就刊出头天“特派员某日发”的记事,而记事都是记的当天的消息。

(2) 不惜版面,详细报道。其中夕刊第一页如果刊登了某地战况有大的进展的话,那么朝刊的第二页就要对夕刊的消息做进一步的细节报道。

(3) 每天要刊登一两张飞机运来的照片。其中的一张一定要展

现“皇军”威风凛凛的形象,每攻占一地还要拍摄一张日军在占领地升起军旗高呼万岁的照片,以达到煽动民众、提高士气的作用。

(4) 对武汉市内的报道也很详细,似乎有情报网。有时是转载路透社的消息。但都是讲在日军的进逼下如何如何地混乱,一定要带上鄙视挖苦的口气,用“混乱”、“无秩序”之类的字眼。

四、“主观报道”倾向和“号外”

在日本新闻界,一般认为战前和战争期间各报刊的战争报道具有一种“主观报道”的倾向,特别是1937年日中战争爆发到1942年中途岛海战的一段时间。^①正如前面我们列举的新闻的标题表现的,这样的“主观报道”和只报道好的而不报道或者将坏的也说成是好消息的“大本营发表”^②有着一定的区别,但其主要特点是报道机关的主观意识(乃至利益关系)和日本军方乃至政府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从而呈现出纸面上的是“战意高昂”以及对战争另一方



^① 请参照杉山光信著《被主观化的战争报道》一文。载《新闻集成·昭和编年史·昭和十三年度版IV·广东、武汉陷落》,明治大正昭和新闻研究会平成三年(1991)版前页。

^② “大本营”指战争期间日本陆军和海军设置的最高统帅机关。“大本营发表”指二战期间大本营发表的有关战争情况的正式通报。在战争初期仗打得顺利时还比较符合实际情况,但也有故意隐瞒的。譬如武汉会战期间有关101师团长伊东政喜受伤的发表,差不多隐瞒了两个月(见1938年10月31日的《朝日新闻》)。二战后期,特别是中途岛海战战争形势逆转后,开始隐瞒己方的损失和失败,最后基本上是虚伪的发表。现代日语中“大本营发表”已经成为带有欺瞒性和虚假性的公开发表的代名词。

的鄙视和反面报道充斥泛滥；使用的言词也大都带有强烈的夸张性、感情性、主体性，拍摄的日军的照片大多具有表演性质。

下面谈一下“号外”的特殊作用。

中文的“号外”一词是日语外来词，也可以说“号外”本身发明于日本。《辞海》对于报纸号外的解释是：“定期出版的报刊，在前一期已出版，后一期尚未出版的一段时间内，对发



生的重大新闻和特殊事件，(报社)为迅速及时地向读者报道而临时编印的报刊，因不列入原有的编号，故名。”

据称日本报刊的“号外”始于明治维新的1868年。《朝日新闻》的“号外”则可追溯到1890年。朝日新闻社利用“号外”的形式，抢先发表帝国宪法的全文，人气一举爆发，压倒了竞争对手。此后，朝日新闻非常重视“号外”，迄今已经发行了5000余号。

但是，“号外”是一柄双刃剑。消息快，非常具有煽动性，但消息不准确、故意利用或被人利用时，又会起到非常恶劣的作用。典型的是1931年9月19日《朝日新闻》发布的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号外”，居然称“奉军爆炸满铁线”，起到了为关东军隐瞒犯罪行径的瞒天过海的作用。

1938年10月26日、27日、28日三天，《朝日新闻》连续发布了占领武汉的三张号外。

城入口漢々堂軍皇ノ歳萬げ揺も軸地

航空機文圖一(本報特派員) 航空機風汐社本ふけ 影撮員派特木大 日六十二



軍 朝 日 新 聞

外 號

この號外は本紙に
は再録致しません



けうを禮敬の兵一リタイ (右下) (自機乗る〇〇軍海上陸海陸軍隊にてに校學小人本日口漢一擧接の士勇海陸 激感 (上) 寫真
てに口入風別特口漢一迎歡の 攝本 氏デジリブ事領一リタイ (左下) 隊部野往るす進前を編別特口漢 て

第一张“号外”是报道日军占领汉口的“写真第一报”。(P7 图中的“第三号外”字样,是因为26日《朝日新闻》前两个是关于日军占领广州的“号外”。)是10月26日早上从朝日新闻社的飞机上拍摄、由“汐风号”飞机运到日本的照片。据25日《朝日新闻》刊登的

大本营报道,日军是25日下午4时突入汉口的,控制整个汉口还要花费两三天时间。这张照片不去拍摄汉口的其他地区,专门拍摄日本租界上空浓烟滚滚,大概是要说日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吧!

第二个《号外》(见 P8)是10月27日拍摄的,大标题为《前进的军旗,万岁!现在攻陷了武汉》。上图是日军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前高呼“万岁”的合影。这张照片现流传甚广,原始出处就是《朝日新闻》的这份《号外》。号外的下图是报道10月26号日军扫荡武昌市内的作战照片,颇有真实感。第一、二、三条纸面消息宣布日军占领了武汉三镇,切断了粤汉线。第四条讲汉口已经开始恢复和平,消息居然称“支那市民已经习惯新的汉口,今朝已经带着欢乐的微笑来往于街头。”另外,这份《号外》的照片是由“白鹭号”飞机和“海风号”飞机从武汉经由某某(即二套口机场)接力飞行运回日本福冈的。“海风号”飞行员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一年前创造世界航空新纪录的饭沼正明。

10月28日的第三份“号外”(见 P9),标题为《天摇地动的万岁声!皇军威风凛凛汉口入城》。上面是日本海陆军会师的照片。右下图是日军接受意大利士兵的敬礼(意大利领事馆前)。左下图为受到意大利领事布里齐德的欢迎。下面两张照片似乎是想说明日军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欢迎吧。

结 语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和军方运用各种法律和法令来限制办报自由,封锁反政府的言论活动。“日中战争”特别是“武汉攻略”期间,还采取组织作家到前线采访参观等措施,主动利用舆论特别是报刊,作为动员日本民众参加战争、提高军队士气、为侵略战争披上合法外衣的手段。

在这样的环境中,以《朝日新闻》为首的新闻界不但没有顶住